

王雲五主編・

特

號

當代以色列小說選

亞格農等著
徐進夫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亞格
徐進

當代以色列小說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卽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譯 註

一、以的希語 (Yiddish) 為歐美各地猶太人所通用之語言，係受希伯來語及南斯拉夫語影響，而以希伯來文字母所構成的德國方言。

二、錫安主義 (Zionism)：或譯耶山主義，係一種以猶太教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復興運動，故亦可稱之為猶太民族主義。由於錫安 (Zion，或譯耶山) 係耶路撒冷建造神殿的所在，故此詞有時亦用以包舉全城及猶太教，因此猶太人即用以作為實現他們先知理想的號召目標；蓋他們的先知曾熱望以此作為世界教化的中心，如下錄「以賽亞書」第一章第二至第四節所述：……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按即錫安或耶山）必堅立，超乎諸山之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民前往說：「來呀，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的神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道……」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把鎗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其他類似大同世界的描繪尚多，都是他們先知所熱望，也是這個主義所懸示的目標，文

長不錄。一九三三年猶太人會召開世界大會，通告所有猶太人，凡年在十八歲以上者，均須認捐一 Shekel（約合二二四英厘）；並於芝加哥百年紀念展覽會上，舉行一猶太日，到會猶太人有二十五萬之多，議決四年內募款八百萬元，預計移殖五萬戶——二十五萬猶太人至巴勒斯坦，以便有足夠的猶太人佔領該地，而後待有統治權的猶太政府組織起來，成立國家的條件即已具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依據聯合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決議，一個現代猶太國——即今之以色列國，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於焉誕生。（參閱袁定安：「猶太教概論」，商務人文庫一一一三）

前言

Joel Blocker

今日的以色列，雖是一個寫作與讀書風氣極盛的國家，但現代希伯來文學卻幾乎回到了二百年前的狀態；而它早期的作品，不是非小說類的文章，便是說教的意味太濃，除了僅具小說的形式外，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小說。真正描繪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生活的希伯來文學作品，自從具有影響力的猶太社區建立以來，至今才不過六十年的歷史。直到最近十年間，可能的讀者從未超過五十萬，實數當較此少得多多。

以色列的建國及其迅速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希伯來文學的舊規。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為政府的大力推行，將希伯來文作品轉化為國民文學；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在短期內將遷返之僑民同化於希伯來文化的傑出能力，首次給它的作者提供了真正的讀衆。直到最近，許多作家才體認到他們未曾親知讀者的意趣。

但從歷史上觀之，撐持希伯來文學的，祇是數量相當稀少的一小群作者，與十九、二十世紀初年在東歐猶人中一直興盛的以的希語（註一）文學相較，祇能算是屬於少數人的圈內文學而已。

。以量言之，它雖創作了數字可觀的作品，給了它堅強而又多產的擁護者以一種崇高的頌讚；但以質觀之，由於一直未能建立群眾基礎，它所遭受的困扼是可以想見的，而此種影響迄今未能消除。

十九世紀引導現代希伯來文藝復興的啓蒙作家，大都有著社會主義的傾向。他們從社會及宗教改革上，特別是從教育方面，謀求解放東歐的猶太人民。他們文學語調的特色是教導和規勸。即以今日的許多以色列作家而言，文學的功能係以教育和啓導爲主，美學欣賞和性靈陶冶仍居次要。

本世紀之初取代啓蒙文學而成爲希伯來文化主力的錫安主義（註二），對於希伯來文學，亦有著相似的影響。對於此一時期的希伯來作家而言，錫安主義不僅是號召猶人返回故國的政治信條，同是亦是一種包含生活諸面，倡導從滅絕異邦的厄運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意識。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希伯來散文，即忠實地描繪了猶太社區在巴勒斯坦的奮鬥情形。它的目標與企圖記錄該區進展實況的人民，相互一致。於此，由於作家大都埋首於歷史之記述，不僅放棄了批判的職能，同時亦無可避免地使文學染上了政治色彩。此外，由於大多數作家，跟他們的多數同胞一樣，皆與當時存在於巴勒斯坦（及今仍存在於今日的以色列）的政治景況中的某種色彩相互提攜，致使他們的作品不僅具有了廣泛的革命意識，同時亦攝入了偏狹的黨派觀念。不過，從多方面觀之，歷史事實的強大與黨派宣傳的渺小，其間的差異頗爲微弱。

所幸的是，以上所述各節，並非事情的全部。如本集所選的九篇小說所示。誠如艾爾特先生在序評中所作的鑑賞一樣，當代以色列小說作品並不僅是政治觀念的表露，其他可供玩味的亦復不少。雖然，此處所選的幾位作家，幾乎沒有一位不會受過此一政治觀念的薰染，每一位均會以其各別的方式服膺錫安主義的基本信念；但他們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並不僅是那種單純的影像，同時亦有着對於生活環境的批判。例如：「這也是猶太人的一種特性，」一篇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說道，「……以毫無保留的信心去信，以全心全意的，熾熱瘋狂的信心去信；但是，却又有一些兒不信，最些微的一些兒——且讓這些微的一些兒去作決定……。」

爲與以色列的別種文學求得一致起見，本書所選各篇小說，不但沒有滲入些微這個國家的政治色彩，而事實上，這些作品並非因了它們具有「代表性」入選：除了編者認爲堪稱當代以色列小說最佳樣品而以文學價值作爲衡量的標準予以收入外，它們不但什麼也不代表，與最近出自美國和以色列某些流行小說相反的，它們既未說明猶太墾殖區的生活情況，亦未描述年青貌美的女子加入富於男性魅力的軍隊的感想，甚至對於六十萬猶太人如何擊敗四千萬阿拉伯人，建立一個能够生存的現代國家，亦無解說的企圖。一個意志堅強的政治意識，是很容易扭曲成流行的神話和狂想的。這些超越原始文學意圖的小說作品，將可矯正當前某些人士對於錫安主義和這個國家的誤解和惡感。

序 評

Robert Alter

這本以色列小說集，具體表現了常被斷言的一半真實的另一半。有人說，現代希伯來語文學跟以的希語文學一樣，在西方純正文學活動中，尚未受到較大的關注。希伯來語作家對人類的狀況及其所有影響深遠的悲劇或喜劇的一切可能性，通常均不太關心，他們祇著力於猶太人處境的描寫，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有人說，希伯來語和以的希語作家發展了一種儀型論的系統（system of typology）而非性格刻劃的方法。因為他們最關心的乃是猶太民族——它的特質和它當前或最後的命運，故而在別國文學中視為中心的個人，在此便被置於他們視野的週邊或之外。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上個世紀的希伯來文字，試看一下當時小說家與詩人所常提出的陰鬱問題：「作為一個猶太人的意義如何？」而不僅是：「作為一個人的意義何在？」即可知道，此言實屬不虛。此種焦點的縮小是很易理解的：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在中歐及東歐地區用希伯來文創作一種現世文學，其本身即是一種反抗文化，甚至冒犯民族主義的挑戰行為。自從啓蒙時代以來，希伯來文學活動即已成為猶太人現世文化復興的重要表現；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它且與（甚

或導向)錫安主義的民族主義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此，有那麼多的歐洲出生的希伯來文作家潛心猶太人民的處境和猶太文化的前途，有時排斥其他主題，乃至損害他們的文學藝術一點，說來亦不足為怪。

此種對於現代希伯來文學上的文化自覺，係一項歷史性的問題。另一方面，本書所選的九篇小說雖僅是目前的一個事件——所有這些小說全是最近數年的一些成果——但一種重要的變化已經發生。上一代的文學係由它的兩位特出作家——亞格農 (S. Y. Agnon) 和哈作斯 (Haim Hagan) 所代表；他們各以其不同的方法，結束了希伯來文學的歐洲傳統影響。其他六位原來出生於以色列或自幼遷返此一新國的青年作家，其中除了一人描寫脫離寄居國之痛苦情形外，另外五人各皆訴述了一些別的問題。

從某方面說來，亞格農的兩篇小說，概略地說明了希伯來小說從舊至新的傳變情形；它們表現出亞氏乃是一位具有兩面臉孔的門神：他一方面渴慕地緬懷著猶太人的光輝歷史，同時又勇敢地面對著各種傳統價值互相衝突的二十世紀。從表面看來，他的「黛拉婆婆」一作，似乎是屬於人們自然以之與希伯來文，特別是以的希語文學相提並論的那種可愛的一類；但黛拉對於該文的敘述者而言，顯然不祇是一個動人而又好奇的人物類型。她是那種業已過去了的世界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她為亞氏那個業已過去了的世界的獨特偉大——它之將日常生活轉變為特種的神聖養生法的能力，作了示範的說明。黛拉之在這個世間神祕地活過了她應享的壽數，乃是亞氏之過去

及現在感的一種特質，因為他祇有從一個生於「四、五代以前」的人物身上，才能看得到此種神聖之虞。因此，這篇小說既是一位聖徒似的婦人的畫像，同時也是一首悼念那個業已逝去了的生活之道的哀歌。文中不時暗示著過去的完整和現在的缺憾，例如，那位殘廢寡婦之抱怨人們如今所用的火爐不若過去，黛拉之不信任敘述者所用的新奇鋼筆，而要他用鵝毛筆寫在「人們知道如何製造好紙時」所作的古舊信箋之上等，即是。黛拉之在故事的結束處辭世，不僅是一篇傳記小說的顯然結局；一向注意語調與細節控制的亞氏，在此以一種頗富深意的死亡與遺棄的形象結束了本文。敘述者反覆地想道：「黛拉已經丟下我們走了，」而我們亦可在此加上一句：她的世界亦然。

另一方面，在他的另一篇小說「千古事」中，亞笛爾阿姆斯特的世界則除去了所有一切可以確定的事物和對於聖性之愛的單純情感，而這原是黛拉舊世界的特質。假如這篇小說中有任何與傳統的聖性相當之處的話，說來亦頗荒謬，那就是癡癡病人收容所。在阿姆斯特的神聖城中，與神聖的律法手卷相等的東西，乃是那本關於古城甘尼達他的謎樣的史書。這本書雖然沾滿了那些活死人——歷代癡癡病患——的膿和血，但對主角而言，却是他一生中最高貴珍貴的寶物。在這個故事的象徵性結構中，有許多細節顯示出亞氏心中的一套關於猶太的特別引證（其中之一是主角的名字亞笛爾阿姆斯特，其意為「上帝榮耀這個民族」）。但這篇「猶太」小說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它所關注的問題，並不在於真實意義的民族；因為假如癡癡病人真的象徵猶太民族的話

，那麼民族一詞，在此已成了一個形而上的概念。阿姆斯之對於作爲一個猶太人的意義的發現，同時也是（至少在含意上）對於作爲一個人的意義的揭發。讀者不必揭開所有這些象徵的神祕，亦可在阿姆斯心中觸摸到一個可信的人物，因爲他對於犯罪、犧牲，及其本身的荒謬特質，已經有了一個決定性的新認識。

與此相反的，哈作斯的「說教」，則是一篇探索民族問題的作品，與希伯來的小說傳統，頗爲相合；否則，也許可以說是那個傳統的最後一個姿態——因爲主角尤得加的地位已明白暗示出：自此以後，猶太人將不再有自我追詢的理由或需要。但我們應說明白的是：尤得加之憤然否定整個猶太歷史，乃是一個小說人物的爭論，而非作者所作的論文。尤得加（此名希伯來文的意思「小猶太」）所代表的乃是哈氏對錫安主義及其真實或想像的猶太史延續問題所作之辯證的一個極端。他的創造者雖然賦予他深切的透視力和對於自欺的強烈惡感，但他也是一個性情急躁，知識有限的小說人物，故而有此誇大其詞的衝力。哈氏在他的幾部近作長篇中，雖然顯示出他是一個十足的現世錫安主義者和猶太生活超越論的強硬對手，但他亦堅持錫安主義的基本立場：以色列應過一種正常猶太生活，而非決然與之一刀兩斷。因此，對於哈氏而言，與其說尤得加是他的一個代言者，毋寧說是他的一個拗性人物，較爲適當。

不論如何，一個猶太人應該怎樣或應該如何處身的問題，雖然仍是哈氏作品中的中心主題，但年青一代的作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並非全然如此。他們雖與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其他許多猶

太人一樣，對於身為猶太人而深感痛苦，但他們却很少拿那種左右為難的生活困境作為他們創作的焦點。在本書所選的幾篇小說中，只有青年作家梅介德（Aharon Megged）的「名字之爭」以此作為描述的主題。而梅氏所寫的這個故事，似乎亦只是這個題目的一個淒慘的最終告白，很難引致更進一步的考量。其中的那對以色列小夫妻終於不得不承認將他們和外祖父隔離的那條鴻溝無法溝通：這篇小說像亞格農的「黛拉婆婆」一樣，終以一種遺棄和孤獨的調味予以結束。

此種有關文化失傳的問題，確是反覆出現於以色列土生作家作品中的主題。事實上，它也是易查耳（S. Yizhar）的被許多以色列青年知識份子認為取自當代但卻最富精神遺產的長篇小說「柴拉格的日子」中一個主要論點。但要明白的是：以被從過去切斷的哀傷作為小說的主題，是有其限度的，因此，將精神完全集中在這個問題的上面，除了沉迷於自怨自艾的境地外，結果將不會反映出什麼別的東西來。所幸的是，年青一代的希伯來作家已不再拿它作為主要論題。錫安主義之「正常化」的猶太生活理想的實踐，似乎已帶來了一種健全的希伯來文學。以色列的青年作家寫作小說時，通常並不考慮他們民族的命運或其未來的問題。與英國、美國，或法國的青年作家一樣，他們自覺是為美所感，為煩惱所困，或為新鮮的生活經驗所興奮的特殊的個人，而努力將他們個人對真實的影像寫成小說。他們之口說希伯來語和身住聖經產地的事實，對於他們的想像之所以沒有特別支配作用的原因，乃因為他們自幼即說這種語言，從小就住這個國家，並無新奇之處。此種感覺由康紐克——（Yoran Kaniuk）的人物葛來茲在他的特拉維夫童年生

活中具體生動地描繪了出來：「而今城市追逐著我們，荒地退穩了，而我之所以要叫『唉噫噫噫』，乃因為我出生於此。假如我生在德國，我就會叫『噢』，假如我生在美國，我就要叫『哦』，夢兒埋葬於此……」而這便是自認民族身份為當然之事的作家所作之事：祇管發掘被埋葬了的夢境，不去理會他所自然叫出的「唉噫噫噫」的文化意義——亦即康氏以相當效果所作的事兒。

對於美國讀者而言，以色列作家之刻正從事於全世界嚴肅作家通常所作之事一點，似乎並無特別之處；但若將以色列青年作家所處的寫作環境考量一下的話，就會對他們的正直堅毅有所欽敬。人們也許認為，在一個四面受敵所困，被迫維持大量軍費的新興國家中，文學的生產必然地會為偏激的或正當的愛國心之經常誇耀所損害。有一個時期，在希伯來青年作家可以熱忱和智慧竭力去發掘他們所處的現實之時，許多批評家，部份老作家，報刊輿論，政府要人，以及他們的黨部，都不時指望他們去做別的一些事情。例如，一九六二年春季，在希伯來作家協會二十屆年會開會時，青年小說家和詩人即遭受了兩面夾攻。大會首先宣讀了內閣總理的訓辭，對希伯來作家的缺乏社會責任，對他們之未能運用作品號召流亡猶人返國，作了嚴厲的申斥。接著是偶像破壞者尤得加的創造者哈作斯，發表了一篇公開演講，對於青年作家之背向猶太光輝傳統，和以色列大眾之無視希伯來文學作品，作了同樣激烈的攻擊。

誠然，希伯來文學確須在淹沒它的少數讀眾的翻譯文化浪潮中，努力站穩其自身的脚跟。但事實上，以色列的固有文學之所以一直顯得蒼白無力的原因，並非如哈氏所指的係由於作家之未

能真正猶太化，而是因為他們尚未覓得適當的表現途徑之故。本書所集的小說提供了兩個令人鼓舞的跡象：第一，青年一代的希伯來作家已在努力尋求他們能够或應該自動去作而非由別人囑望他們去做的工作；第二，青年一代的作家已開始為他們各人表達的需要去尋求富有個性的獨特心聲。

本書所收青年作家所作的六篇小說中，有四篇係以戰爭或與戰爭相當的政治情況為背景。每一篇雖以戰爭為背景，但作者所真正關心的卻是人類及其道德或精神生活問題，這是頗有意義的一點。在夏美爾（Moshe Shamir）的「近親」中，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難以緩和的緊張關係，對於這篇小說的中心問題而言，是頗為出人意表的。夏氏所致力探索的乃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緊張關係——那種由於愛的衝突而發生於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作者利用了一個嚴重的邊界意外事件，建立他所需要的情境。其實，幾乎任何別種形式的暴亂，亦同樣可以作到。

以巴勒斯坦托管期最後數年的敵對狀態作為背景的托姆斯（Benjamin Tammuz）的「捲帆布」，則是一篇關於分歧的忠順及道德發展的研究。實在說來，這篇小說具有兩個趣味中心：其一是勇敢、慈愛，且有著敏銳良知的卡茲；其次是帶著我們去看卡茲的年青敘述者。卡茲之表現他對戰鬪信念的吉阿德式的努力，其所以獲得我們同情的原因，乃由於他的信念暗示出了：在我們這個世界中有許多人雖在難以控制的暴力漩渦中打轉時，仍能掙扎著保持獨立的道德本質的苦況。而這位向我們數述卡茲行動的激進的以色列青年，亦從他身上學得了一些教訓。儘管他

在表面上對這個寫作詩句和反對暴力的卡茲表示輕蔑，但他顯然亦為他的懸直所迷。卡茲所代表的是另一種道德自覺，這使疑惑地觀察著他的青年敘述者不得不承認他自己生活意義的偏狹和窄小。

托氏在這篇小說中所提出的問題——在威脅其自身的歷史情況之前對於個人良知的主張，近年已成了以色列小說的一種重要主題。獨立戰爭以及其後的西奈戰役，對於希伯來嚴肅作家而言，不但沒有成為一種榮耀事件，且常以一種壓抑的記憶出現於他們的作品之中：許多小說為那種人被號召起來以國家名義去作謀殺的恐怖情況所述。此種對於創傷經驗的回憶，所步的係康紐克的 *The Acrophile* 中主角的後塵。梅介德的「愚人之事」中的同樣創傷，揭露了主角心中的道德危機。此種由於戰爭所導致的泯滅良知的危機，係易查耳「柴格拉的日子」的中心主題，亦如他在本書所錄的短篇「俘虜」一作中所表現的一樣。在這兩篇作品中，沙特派的存在主義對於易氏的影響是很顯然的。在一個完全無視人類事業的荒謬世界中，人必須勇敢地對他自身的道德決心擔負完全責任。每一次決定就如——用沙特的話說——他係為整個人類而作一樣。「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一個聲音在「俘虜」一作中的敘述者心裡悄聲說道，「這是一個反抗的日子。這是一個你終於有權選擇的日子，而你正握著決定的權力。」

在這類小說中，對於戰爭影響而導致的道德衰敗所提出的抗議，以阿米海（Yehuda Amichai）的「二頭爭奪戰」最為突出，至少，從技巧的觀點看來如此。故事的夢樣進行，荒謬